

---

# ZAN Tao × Tsuyoshi Ishii

[沓涛 × 石井刚 2020年1月22日]

# Contents

序 中岛隆博（东亚艺文书院院长） .....	1
对谈 咎涛×石井刚 .....	2
后记 .....	23
对谈人简介 .....	27

# 序

中島隆博（東アジア藝文書院院長）

2019年に発足した東アジア藝文書院は、東アジア教養学という来るべき学問のために、その成果を積極的に刊行していこうと考えています。ここにお届けするのは、EAA ダイアログと銘打ったシリーズです。

ダイアログとはプラトンに由来する概念で、dia-logos すなわち「ロゴスを通じて」という古い意味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ロゴス」には、言葉や論理に加えて、万物の根源や批判的な切断という複数の意味が重層的に交差しています。東アジアの概念に翻訳をするならば、おそらく「道」や「文」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道」は語ることであり根源でありますし、「文」もまた言葉であり切り分けられたパターンであるからです。重要なことは、ダイアログは誰かとともに対話を行い、お互いにロゴスを吟味しあって、新しい地平を開こうとすることだと思えます。

EAA ダイアログは、東アジア藝文書院に集っていただいた方々との対話から生まれています。読者のみなさまには、そこに込められた学問への思いや望みを受け止め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何ができるかだけでなく、何を欲するのかが、来るべき学問にとってはどうしても必要なことだからです。

現在の covid-19 のパンデミックがあぶり出したのは、「既知」の諸問題でした。それらはすでにわかっ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様々な理由から「できない」とされてきたものです。来るべき学問は、そうした「既知」の枠組みを乗り越えるために、真に「未知」なるものに触れる責任があると思えます。

EAA ダイアログを通じて、ともに「未知」なるものを思考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 ZAN Tao × Tsuyoshi Ishii

[咎涛 × 石井刚 2020年1月22日]

**石井** 好，那么开始吧。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 EAA Dialogue，实际上对您来讲是第二个 Dialogue，昨天刚跟羽田正老师谈过一次。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谈什么问题，所以也许今天我问的问题可能会有些重复的，但是昨天和今天区别是，昨天是英语，今天是汉语。那么可能语言不一样的话，可能想法会有些变化。

**咎** 是的。

**石井** 我也很期待。据我了解在中国研究您这个领域，中东研究的学者应该很少很少。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域研究工作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是，少年时代的您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如何对现在这个领域产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走入这个学术领域。

### 对于外国史和理论的兴趣

**咎** 1997年开始在北大念历史系的本科，高年级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世界史”，昨天还跟羽田正教授聊了一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别。简单说，就是本国史和外国史的区别，要说自己为什么选择中东研究，可能得从自己选择外国史说起来。可能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更强烈吧，时代的氛围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会觉得未来找工作的范围也可能更大些。那个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就是凭感觉。说实话，工作以后，因为做我这个方面感觉太难、太累，成果也不容易出，有段时间我还后悔没选本国史呢。

**石井** 因为要学很多语言。

答 没错，学语言是一方面，而且最后做出来的很多学术的成果在本国史老师那里看来好像也不怎么样，水平也不够。这个时候我就自我觉得付出的比别人看起来要多，但好像又做不出什么能够得到的肯定的东西。很沮丧。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大概 30 岁左右的时候，有点儿开始怀疑人生。

石井 博士毕业的时候开始怀疑？

答 对对。挺好玩儿的，其实工作也确定了，可能也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儿了，也有对比了，难免会去想，费那么大劲搞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说回学术兴趣，一个方面就是，一直推动着自己的，是从很局限的生活环境，到慢慢长大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就是视野的扩大，扩大之后就是越来越想认识这个世界，尤其是对外国的东西充满好奇。这应该说是自己选择外国史的原因。如果不选外国史，也不可能做到中东这一块。在北大历史系，现代外国史又大致上分块，一个叫西方/西洋。第二个叫亚非拉，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是有关系的，应该是研究第三世界的需要。

本科生还有一个是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的要求，也就是“二外”。

石井 那一外是英语？

答 一外基本上都是英语，大家从初中就开始学了，可能有的人更早。这个二外选什么当时琢磨的时候就觉得，最初想的是学欧洲语言。后来我选了日语，因为我宿舍同学都选了欧洲的语言了，大家想的是，每个人都学个不一样的东西。

石井 那是你 1 年级的时候吗？

答 不，大概是本科 3 年级的时候，别人的都选了欧洲的语言，什么法语啊，德语啊……

石井 俄语。

答 俄语好像没有，主要是法语和德语。我觉得日语也挺重要的。二外其实就是学一个入门嘛，就学 1 年，不是要求很高。您看，说到这里似乎还是跟学习土耳其没啥关系。我慢慢说哈。本科的时候，我对纯粹的历史学兴趣不太大，也就是那个时候强调的一些传统史学的做法。作为一个本科生，我当时抱有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主要还是想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比如，美国、日本的一些东西。我是希望通过外国历史的学习，能

加深了解这个现实世界。另外，我对理论、哲学也很感兴趣，印象深刻的是，选过一门卡尔·波普的历史哲学，读了他那本书叫《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觉得挺受震动的，因为跟以前了解的很不一样。老师还带着我们翻译那本书，每人1章。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收获很大。

**石井** 这也是本科生的课吗？

**管** 是本科生的课。另外，我也去旁听社会学系的课，关于社会理论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能帮助我来认识现代的这些事，能解答我的一些疑惑吧，我念本科的时候就是对一些理论性、思想性的东西很有兴趣。

**石井** 也就是说，你了解现代的事情，为了了解现代的事情反而，不知道恰当不恰当，退回到原理上的一些……

**管** 是的，我对理论感兴趣，我后来发现理论让我非常着迷，然后我还去……

**石井** 是是是，那当时社会学看的是哪些书？

**管** 其实也是所谓3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些东西让我很着迷，我觉得我后来再去听历史的课，我更感兴趣的也是这类东西，包括社会心理学，像弗洛伊德什么的，我还尝试写过作业，大概是分析拿破仑的心理与性格。当时的我，就是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如果说有一个时间点的变化，大概是在大3的时候，后来成了我导师的董正华教授开了一门课，是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理论方面的。

**石井** 那位老师是？

**管** 是历史系的。

**石井** 那个老师是做哪国？

**管** 董老师是亚非拉教研室的。他的兴趣很广泛，研究现代化理论、史学理论，还有就是东亚的农业现代化。但他在硕士阶段研究过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也持续保持在这个方面的兴趣。我上他的课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喜欢的东西，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待历史的变化，关注近代经济的、政治的历史进程，尤其是西方对东方的影响，介绍罗荣渠先生的“一元多线”史观，以及中国、日本、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从思想史角度讲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理论，批判性地介绍很多1950年代以后美国所出现的社科领域的现代化理论，再到当下关于modernity/现代性的各种讨论，还有postcolonial的各种问题，这些理论，他都进行了很好地梳理和讲述。我很喜欢这门课。也读了一些

课上介绍的相关书籍。这个课要写一个 paper，我当时选了写卢梭的思想，因为对文学感兴趣，其实我是把卢梭当文学作品读的。

石井 《爱弥儿》。

管 除了这些，当然还包括《论科学与艺术》，然后是《社会契约论》之类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名著系列里的，当然都是前人翻译的作品。在这之前，我选过高毅教授跟法国历史有关的课程，也自己读过卢梭的传记，比较早就喜欢上卢梭的文字和文采。听现代化方面的课的时候发现，既然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 enlightenment，特别强调启蒙，那么，卢梭也是启蒙时代的一个人，可是读完卢梭的东西，我发现他并不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种工具理性倾向的人。卢梭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人。我就沿着这个思路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看，当然很幼稚。不过，当时我还是挺兴奋地沿着这个思路想：如果说启蒙在思想上奠定了所谓的 modernity，那么，这个 modernity 是不是从诞生开始就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分裂。那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对人意味着什么？

而卢梭就是这个代表，我是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和阅读文献的。就写了这么个小 paper。今天实在不值一提。但当时，老师还是很肯定我



的。给我的分数也很高，还被表扬了，老师觉得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您看，虽然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但是我对这种理论性的、思辨性的东西，一直很感兴趣。

## 为何走进中东研究：本科毕业论文与硕士阶段

**管** 后来，大四的时候是要找老师指导毕业论文，我就找到了董老师。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对老师也不了解。董老师问我你想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他给了我一些题目，这就是老师平时的积累，其实我现在做老师了也知道，自己平时也会积累一些题目，有时候也会给学生去做。董老师的题目是写在一张纸上的，大概有 10 个题目，我现在只能记得我选的那一个，就是二战后的土耳其军人政变。我当时当然不理解老师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但我对军事有兴趣，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很偶然的，其实我那时候对土耳其一无所知，学校好像也没有人讲跟土耳其有关的课，连讲座我都没有听说过。

**石井** 那时候你大 4？

**管** 是的。董老师给我介绍了北大、国图的一些英文文献，说我只要梳理清楚这个过程就行了。我也只能看非常有限的英文文献，这个方面当时不光是网络搜索不发达，相关的资料就更少，反正我就把当时关于土耳其的军人政变在中国能够搜索到的资料都看了。后来我发现了亨廷顿，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还有《第三波》，都比较多讲到了军人政变的事情，而且土耳其是他比较关注的案例，我就觉得可以跟亨廷顿做一个对话。一般认为，土耳其的 3 次军人政变导致其民主化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么说过于简化了。亨廷顿给我的启发是，他更加关注秩序。军人政变在土耳其当然有其反民主的一面，但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也有其不得已的历史原因，而且也是每次都较快还政于民，那么，它就是一个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角色。不能笼统说它打断了民主化的进程。

**石井** 就是上次你讲的那个主要的论点之一，就是这个。

**管** 老师对我这个思路觉得也是有意思的，就让我写这个。当然这个对历史的分析，是有理论关怀的。那时候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理论。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没有一手的资料，



更多地我的 construction, 我写了这样的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很典型的史学作业。

**石井** 是的, 挑战亨廷顿。

**管** 同时, 我也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我在我们班的那个绩点 credit 排名比较靠前, 40 个人大概是第 5。这样我就有一个能够免试保送研究生的资格。当然, 我想跟着董老师念硕士。

**石井** 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找工作的意思?

**管** 没有, 要保送了, 读硕士了, 我就说我跟着这个老师。保送研究生之后, 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自由的, 就是写写毕业论文, 大段时间一直到暑假, 好几个月。这个时间, 我又再继续坚持自学日语。北大那个教材之外, 又找了那个《标准日语》。

**石井** 黄皮的那个?

**管** 嗯, 黄皮的那个。读研时候老师就问我, 那你想跟我做什么方向? 我说我研究了军人政变后觉得对土耳其这个国家非常有兴趣, 我想做土耳其这个研究。他说如果只做一个硕士论文倒也没问题。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在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的这个时候中国的世界史、外国史研究, 大部分主要是用英文文献。我们得考虑到这个时代条件。也就是说, 很多是从英文的二手文献里面提出问题来做的。

研究生也要选二外。我当时想学土耳其语, 但是北大一向没这个课, 我甚至去北外问过, 但是他们是 4 年招一届学生, 而且还有人跟我说, 基本不可能接受旁听, 可能还要交 1 万块钱的学费。

**石井** 哇。

**管** 你知道 20 年前的 1 万块钱, 我承担不起。我就继续学二外日语, 就是把日语保持一下而已。

**石井** 那当时你去北外想学的是哪一种语言?

**管** 就是土耳其语。后来我导师有了一个机会, 就是 01 年和 03 年, 他两次邀请了 Isenbike Togan 教授到北大讲学, Togan 教授是著名学者, 研究内亚史的, 兼及中国、奥斯曼, 但主要是古代。她是董老师的好朋友, 她来讲学的时候, 除了讲本行, 还给我们讲过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那时, 她的女儿在北京念中医理论的研究生。在讲学期间, 我帮助老师做一些杂事, 老师也就慢慢了解我的学习兴趣了。但在 01 年的时候没有深入交流。03 年初, 她又来了一个月, 这时已经对我比较熟

悉了，她问我，你的志向是什么？我说，老师我准备念博士，研究土耳其历史，她还是挺吃惊的，问我懂土耳其语吗？我就告诉了她自己想学而没有条件学的苦衷，她就说，Why not start now? 后来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的 professional 的语言老师。她在美国教过土耳其语。虽然没有任何教材，但她一边手写一边教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跟她学习一个小时左右，当时她住在北大的勺园公寓。那一个月，我相当于学了 20 多个小时。后来“非典”SARS 爆发了，Togan 教授就回土耳其了。

石井 2004 年。

智 不，是 2003 年。她本来要讲一个学期的，你看，疫情对我的学业是有影响的。回去之后，Togan 老师可能认为我就这样了。就学了一些发音和会话。不过，就我来说，已经入门了，我还是很珍惜很用心的。后来，我还在北师大认识了一个土耳其人。

石井 土耳其人？留学生还是？

智 他就在那儿访学，大概一个学期或者是 1 年。再后来，认识了学土耳其语的中国学生，我把他们的内部教材复印了一套自学。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丢下日文，所以很痛苦，日语和土耳其语老打架。后来就刻意把日语扔下了。我很快就学完了土耳其语的基本语法。可能因为日语也可以算是阿尔泰语系的，所以，对我学习土耳其语语法，帮助非常大。自学也问题不太大，就是听、说不行。2003 年的 9 月份，我转博士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土耳其语的基础了。

## 博士阶段与毕业之后的各种经验

石井 你那个时候是硕博连读？

智 对，硕博连读。

石井 所以说可以有时间专心学习语言。

智 对对对，是这样的。读博士以后，我导师推荐我申请荷兰的南-南合作博士研究基金，South-South 博士生项目（SEPHIS）。花了非常大的工夫准备各种英文材料，也没抱很大希望，后来竟然被选中了，那个时候全球似乎资助的只有 8 个人。

石井 才 8 个？从全球？

答 印象中应该是的。

石井 非常 competitive。

答 我拿到了这个资助。是在 2004 年了，后来年我用这个资助去了土耳其。也就是 Togan 教授所在的中东技术大学历史学系，在安卡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感觉什么都贵，那时候光来回机票就是 1 万块。

石井 很贵。

答 幸亏有荷兰的资助。后来在土耳其的所有困难都在各种人的帮助下克服了，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石井 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答 一共住了 6 个月。

石井 才 6 个月？

答 是的。回想起来，真是非常高效的 6 个月。那时候搜集资料主要靠自己复印和扫描，然后自己制作成 CD，我作了 19 张。因为 Togan 教授的介绍，另外也可能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从中国来学习土耳其历史的，那里很多老师都很热情地帮助我，直接送给我资料或者介绍我去哪里找。我的研究题目是族史重构与民族主义，比较偏意识形态和思想史的研究。资料也比较集中的。当时，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很热点，前几天在东大跟这边的秋叶淳教授，以及来参加活动的笠原弘幸交流，了解到笠原前些年开始做一些相关研究，更早的是日本有一个永田雄三教授，做过相关研究，而且他们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时间跟我几乎是同步的，有的还比我晚。大概是在我的书出版以后，就是最近七、八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域才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可以肯定的是，在土耳其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大概也是最近 10 年才产生的……

石井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国际背景，几乎是同时兴起的，是吧？

答 不久前，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有日本老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出现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是在看土耳其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叫 Türk Tarih Tezi，土耳其史观。然后就搜索这个关键词，很多工具书、百科全书里都没有收录，那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因为这是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官方史学，对它进行研究，必然是 postcolonial approach。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下对民族历史建构的一种解读。我 07 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对 social

theory 的投入更多了一些，我想把自己的研究再系统化、提升，那段时间我受到马戎教授的影响。

石井 谁？

管 马戎教授，就是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最有名的专家。马戎老师也认识到了我这个的潜在价值，而我自己没有认识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研究中国边疆的，关注新疆，他本人又是回族，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角度不同，更有跟中国的相关性。而我博士阶段做历史学研究的时候，跟土耳其的现实就拉开了距离，那时候我在土耳其待了半年，直到回国我连土耳其总理的名字（埃尔多安）都叫不上来。天天关注的是历史资料。受到马戎老师的影响，还有一些现实问题的刺激，比如2008年奥运会火炬在国外受到政治激进分子的攻击，等等，我对自己研究的一些现实意义有了认识。2009年我就回到历史系工作了。然后2010年，国家有一个政策叫对口支援边疆，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都有，北大对口的是西藏大学，我就报名去了西藏大学，需要在那里工作一年。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新疆，也想有机会学维吾尔语，很可惜，因为机制的原因吧，我去了西藏。很不一样的地方是那儿海拔高。

石井 是是。

管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在具体的环境和工作中，我了解了什么是民族问题，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民族主义、nation building 这些问题有了直观的、崭新的认识。这对我的研究是很大的帮助，在工作之余，把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了一个专著。我援藏结束的时候正好出版了。

石井 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啊？

管 2011年。应该说，这一年的经历，对我以后的研究是很好的灵感。尤其是对中国本身，有一个很悠久的帝国传统，可以对我思考研究对象有参照意义。尤其是从拉萨看北京，感受也很不一样。我的感受会被带到对土耳其、对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过程的理解中。

石井 对对，这个非常有意思，那2011年专著出版之后可能一直到现在在北大继续做土耳其奥斯曼的研究，然后又一直到现在就成为了应该说是中国研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

管 奥斯曼帝国算不上，奥斯曼帝国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奥斯曼帝国是我最近三年以来的兴趣。

石井 是吗？

答 对。虽然对奥斯曼帝国相对熟悉，但只是熟悉。

石井 最开始是回溯？然后就是发现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要性？

答 时间不允许，能力上也不够。我们这里不但没有在研究中贯彻一个土耳其语训练的机会，更没有那个奥斯曼语言的课程训练。工作之初的一个做法是在北大先旁听阿拉伯语，很遗憾坚持了不到一个学期。工作很忙，没有坚持下来。后来罗新老师介绍给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 Department for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北大历史系和它有一个合作。我之前已经有些老师去过。在 2012 年底的时候我就去了印第安纳大学。

###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

石井 那刚从西藏回来接着去美国了？

答 不是接着。2011 年的 8 月份完成了援藏工作，下半年主要是休息和恢复身体了。去美国是 2012 年底，也就是西藏工作回来后的三个学期后，也就是一年多以后。到了之后就发现，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地方。

石井 什么语言都有？

答 什么我需要的语言都有。一开始我就进入了乌兹别克语的训练，另外通过 Advanced Turkish 来保持自己的土耳其语。本来就是想待半年的时间，但发现要进修的东西太多了，就申请延长，后来延长到了 1 年半。

石井 1 年半？

答 是的。主要是一些语言训练，两个学期的阿拉伯语，两个学期的乌兹别克语，还有两个学期的高级土耳其语，一个学期的察哈台文。很多是一起学的。算是恶补了一些东西吧。那个时候时间相对宽裕。印第安纳大学在 Bloomington。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有这个大学，其他就是好山好水了。

石井 只能在那学习。

答 跟东大柏校区差不多。

石井 环境特好。

答 只能学习。那儿的系主任很照顾我，跟所有老师都打过招呼，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 sit in。语言课的特点就是人不能多，所以，我看得出来老师们最初是很犹豫的，因为怕我不能坚持，反而占用了教学的时间与资源，学生们都是要单独缴费的。还好，我都坚持下来了，几乎没有缺过

课，考试也正常参加。

**石井** 一次都没缺课。

**管** 几乎是一次没缺过课。除了我一次去土库曼斯坦开会，请了一次假，其他就从来没缺过课。所以后来老师们对我这个访问学者还是有点儿另眼看待吧。

**石井** 为国争光了。

**管** 哈哈……后来乌兹别克语因为人太少，停开了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再学。因为我原来有土耳其语基础嘛，学乌兹别克语不是那么难。我经历过两个助教。授课老师是乌兹别克人，在美国已经待了 20 多年了。另外他要有一个助教，助教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来的，好像是通过 Fulbright 项目来的，这个人一般都是当地的英语老师，因为英语要非常好才行，才能给美国人当助教。但其实就两个正规的学生，再加上我旁听，就是三个学生而已。这个训练挺好的，每天一个小时的课，但作业得做两个小时。每周还有一次 coffee hour，主要是助教带我们了解乌兹别克文化。

阿拉伯语大概是 10 个人左右，算是比较大的课了，老师是一个伊拉克来的中年女性，也是重视听说。

有了这些训练，主要是能比较好地使用工具书了，至少阿拉伯字母和转写这些基础问题克服了吧。后来，2017 年暑假，通过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做奥斯曼文和奥斯曼文学的 philologist 来访问，主要是让他开设了奥斯曼文的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是土耳其语达到中级以上，学过了阿拉伯字母。我当时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想法，就是我这边也有学生对奥斯曼文感兴趣，而且这些学生已经学了土耳其语，这个条件比我当学生的时候要好的多了。两三个学生加上我，就在暑假参加这个奥斯曼文的培训。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我能够依靠工具书读奥斯曼文献很有帮助。所以，这样就开始慢慢涉猎一些奥斯曼文的文献，其实就是基础文献的翻译，目前还在做，速度很慢。经典的文献，我会找来英文的翻译对照看，最近我也开始参考日本也有的一些翻译，都是很零散的。我想，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基本的中文版本，对于学生也是有帮助的。

## 何谓区域研究，如何构想其未来

**石井** 我觉得您讲的非常有意思，而且越往后越有意思。其实我听着有一些感受，有很多感受，感触吧。这里面我可能挑一个观察点吧。咱们想一想咱们的地域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地域研究的时候。我认为地域研究也需要接地气的，这是从两方面可以说，一个是接到咱们所研究的对象地区的一些现实和本土性，可以说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咱们自己作为研究者，存在的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国家，对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管** 对对，完全赞同。

**石井** 是吧。像比如我们的话，他不算是一个地域研究的专家，却在日本影响很大的是竹内好，他是中国文学家吧。

但是他后来二战后的时候，写过很多有关日本二战后的一些情况，社会的新情况。他认为他这样写作发言做研究都是非常“文学”的一个工作，而且也是非常“中国文学”的研究。因为他是向往鲁迅的一种精神。那么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做为一个中国文学专家，在中国待的时间并不长，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话，经常可以，非常容易的去中国跟当地社会接触，跟当地专家接触。但是我们是不是比竹内好更好的接上中国的地气？考虑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如他那时候。因为有一些他对中国的观察，洞察，然后他对自己的社会和自己的文化的反思的深刻性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层面。那么我们以后继续要做这个地域研究，然后对地域研究的发展能做一些贡献的话，大概应该是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跟我说的接地气的问题是离不开、分不开的。所以您在土耳其待了时间并不长，是吧？

**管** 不长。后边也去过，加起来也有几个月。但最长的是第一次。

**石井** 这个很好。其实像我们这一代的话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的。

**管** 当然。

**石井** 但是不一定看的東西一定有那么大的意义，所以时间的长短不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您又有在西藏的经历，是吧。然后又反思中国整个的很大的国家的，或者文明的结构的问题，也都不得不思考，是吧？

**管** 是的。



石井 这些都是支撑着你的研究的。

管 你说的本土性。

石井 本土性。所以说你作为一个从土耳其研究开始做的中国的地域研究专家，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中国的地域研究应该发展的方向，或者是应该如何，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土耳其研究者或者是奥斯曼的研究者，做什么样的地域研究？

管 明白你的意思。简单来说吧，就是中国的区域研究因为现在刚起步，因为这个区域研究刚起步的原因很简单，部分原因就是一带一路给推动的吧。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区域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我也是北大的区域研究院的副院长。不过，每个人理解的区域研究不一样，有的强调基础研究，有的强调智库功能。

石井 但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在日本也好，地域研究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要有的一种智库也好，战略也好，这种东西，是占主流的。

管 地域研究在招生方面，可能应该像很多 business school。就是不从本科生就学 business。而是应该去学文学、语言、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等等，是这些专业的人，最后进入到 business school 或地域研究。

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很好的专业基础训练，再加上语言。这是比较理想的地域研究的样子。也就是说，很难从比较早的时候去刻意培养地域研究的人才，比较好的状态应该是在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之后，让那些对地域研究感兴趣的人进入到地域研究。比如说受过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他们再去做地域研究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进入博士之前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可能会有问题。恐怕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派驻在当地的 journalist 做的水平。很多 journalist 写的东西，其实水平也很好的，只是他没有一些专业训练，他变成了一些生动的东西，是新闻，是报告文学或者是资料。很多人强调跨学科，但跨学科首先得有学科。跨成没学科也是有问题的。而太早进入那种 think tank 模式上的地域研究，可能对学术人才的成长不一定有利。所以，我还是强调应该先受一个专业的训练。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说你要做关于中国的地域研究，那可能就做不到很深刻的。就是您说的那种为什么深刻性降低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思想的、文化的、学科的训练造成的。

石井 对对，是的。



管 我在前年在光明日报教育版发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区域研究需要重视基础学科，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石井 我非常有同感。因为我自己也是本科的时候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念的，所以我当时老师也是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

虽然我学的也不是特别好，但跟那位老师学的东西还是成为我的一个基础。当时我对中国也不一定有那么学术性的兴趣，主观上对中国是一直以来有一些兴趣，比较喜欢思考中国的一些事情。但是后来，至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做学术方面的研究。后来上硕士的时候就想可能要去往中国的方向发展，可能对我自己的对政治思想史的了解有用，才选了地域研究专业，念筑波大学。然后我自己也去了中国，在内蒙古待一段时间，回来再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我不认为是地域研究，虽然我现在分在地域研究的专业，但是我做的是更普遍意义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视角和眼光来看我们所想象的普遍的一些，或者也许是普遍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因为我在想如何安顿我自己的存在，需要有一种，对我来说中国的哲学话语，或者是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可能对我来讲在这意义上是非常有感触的。

### 如何看待“东亚”、“中国”

管 昨天跟羽田老师对话，羽田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在东亚，东亚社会的国家好像都非常地 nationalist，跟欧洲国家比起来。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提了个想法，我说，我觉得欧洲人有共同观念的原因是可以从古希腊找源头，尽管有很多是建构的，另外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它有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可能就是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这样一个存在，而且长期威胁它。你看欧洲战争，为了最终的胜利越来越强调合作一起去打奥斯曼帝国。我们看马丁·路德，在16世纪初的时候，他也很重视土耳其人。欧洲最终是要解决它所谓的东方问题。这是欧洲的他者的情况。另外，欧洲国家比较均衡，尤其是二战后，没有那种超级强大的国家。紧邻的超级强大的国家最后也消失了，欧洲意识长期来看，是有这么一个历史特点的。东亚以前是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是有一个中心的，是围着一个中心来转的，这个中心就是中国这个文化-政治体。这个体系要运转好的话，需要中心足够

强大才行。对了，昨天也在这里碰到了葛兆光老师，他去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庆贺乾隆帝的 80 大寿，他说这是东亚朝贡贸易圈的最后一次盛典。在这次盛典上，他根据安南、朝鲜等朝贡者写的笔记和奏章，发现朝贡圈的情况远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看起来那么美好，来贡者其实各怀鬼胎，但从中国历史视角来看，看不到这些，那都是和谐的、万国来朝的一种盛况。所以，传统上来看，东亚虽然存在中华帝国这样强大的政治体，它对周边它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那周边是有它的主体性的，实践中它是有对策的，它得有自己的方式来“消化”中国。葛老师那篇文章讲的就是周边对中国的“消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比较来看，欧洲的政治结构显然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外部的他者，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后来的苏联可能也可以算得上。我想羽田老师的问题，需要在这个比较中来认识吧。

**石井** 提的很好。今天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属于东亚？可能从您的那个角度说的话中国也不只是东亚，因为西边都是更像中亚嘛。

**管** 没错。

**石井** 我们从这边看的话，中国是属于东亚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是一面之见。

**管** 我想到的就是，需要回答是否存在一个 essentialist 意义上的中国。

**石井**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一个像朝贡体系也好，过去的文明帝国的框架来讲的话，中国更不像是一个东亚的国家。

**管** 朝贡体系其实从历史角度来讲它主要指的是在东亚这一块，但是它一旦涉及到内陆亚洲 (Inner Asia) 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只是在表面是维系一种朝贡体系中心的感觉。

**石井** 但是日本属于朝贡体系的时间并不长。要跟朝鲜、越南……

**管** 还有琉球。

**石井** 所以说现在朝贡体系它的解释框架好像现在被质疑……

**管** 确实，朝贡体系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平衡费正清的那种认识，但也否定不了。也就是它不能用来解释一切，只是从中央王朝的角度来说，在 propaganda 上它要维持这个东西。这是表面的。

**石井** 回到刚才那个我的问题的话，中国是东亚吗？

**管** 我只能说，中国不只是东亚，但从中央王朝的角度来说大部分情况下是东亚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历史政治体，它又是多元的。如果

您知道所谓的“新清史”，这跟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些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算的史学观点，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引发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讨论，这些年已经很多了，其中有一种观点就是只把所谓的“中国本部”看成是中国，其他则被认为是非中国，这当然会引发很大的争议。其实也是对中国进行本质化的、狭隘的解释的一种表现，没有看到中国是个多元复合体，或者是它的多元一体特性。实际上，一旦要讨论中国的性质或属性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考虑到多元特性。一旦考虑多元特性，东亚性就只是中国特性中的一个，尽管可能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但肯定不是唯一的。

**石井** 对，我是这个想法，像比如说汉字，还有一些文化，儒家也好，佛教也好，佛教是不是东亚，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有汉传佛教吧，这个体系，这些，葛兆光先生说的意思，我很认同的一个是朝鲜、日本、中国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形成各自的历史。所以说它不一定很容易赞同欧洲共同体那样一种共同体模式，因为东亚几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独立性更大。这个可能和羽田先生所……

**咎** 他想讨论这个共性的问题，我知道。

**石井** 但是如果我们从东亚这么一个观念解放出来再看的话，中国也不一定是东亚，中国是一个多元体。你们要再跟欧洲相比较的话，欧洲是这么一个以 nation-state 为主的一个体系。其实整个中国的版图和欧洲到乌拉尔山脉领域的面积是差不多的。

**咎** 是这样的，是差不多的。

**石井** 所以说中国和欧洲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体系。所以如果把中国认作是一个国民国家 nation-state 的话，现在是 nation-state，但是 nation-state 的来源，就是历史跟欧洲或者是日本、韩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咎** 也可以说是硬给中国穿上了一件“国民国家”的外衣？

**石井** 对，这个的话反而限制我们对中国的想象。

**咎** 读书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比较历史研究的作品，比如把汉朝中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各国再拿出来单独跟中国的统一王朝进行比较就不是很容易成立。东罗马和隋唐有比较长的一个重叠时期，几乎就是在同一时期，它们都进行了一场“统一运动”，最近读到一本书就讲到这个问题，说中国经过隋唐统一，而东罗马帝国的统一运

动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原因是大瘟疫，这个大瘟疫在欧洲爆发以后，死了大概是 2500 万人，这可能也是使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瘟疫之后他们又遇到另外一个挑战，这就是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几乎是跟隋唐一起崛起的伊斯兰文明。到 15 世纪奥斯曼帝国发展的时候，就把君士坦丁堡都纳入了伊斯兰文明的版图，奥斯曼人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所以，欧洲历史经历了这些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罗马帝国了。欧洲只能走 Westphalia 体系。那中国自然是不一样的，这个比较有意思。

**石井** 是。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是在世界上比较少数的有庞大的穆斯林过林的国家。

**管** 相对其他非穆斯林帝国比较多了吧，现在有 2000 多万。

**石井** 对对。但是中国当然也不是穆斯林的国家，但是穆斯林人口那么多。这个如何去解释中国的这么一个民族的兼容性，或者是宗教的相互兼容性？

**管** 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是通过中国为中心的视角，尤其是以东亚为中心的视角去看待的，有一个把历朝历代连续下来的所谓正统叙事，这个视角可能也限制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当然也存在其他视角的叙事，尤其是在国外。在日本更是如此。但我说过，由于难免涉及到“政治性”，一旦讨论另类视角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比较敏感，比如会想他们是不是心怀不轨，或者是不是要分裂中国？近些年来所谓“新清史”引发的讨论，也有这个特点，而一旦被上升到政治上了，那就不太好讨论了。更不用说，人们也意识到，在某些倾向上，所谓“新清史”背后或引申出来的一些观念，也与日本的帝国主义史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石井** 是是，亚洲史、东洋史。

**管** 也有学者的想法就是我们能否抛开政治，能不能纯粹学术性地讨论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性难以完全摒除，但是不是只有政治性？应该不只是这样，所以，学术的讨论还是要学术地进行吧。

**石井** 其实像你说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啊，像比如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还有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陈寅恪先生也提到的一些唐朝的历史，是吧。所以说，讲多元也不一定就要分裂，或者要否定中国价值的。多元一体是很好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就是

重新思考一下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当然葛兆光先生其他很多学者做的非常好。但是这个可能要再把您的那个土耳其视角或者西藏视角加入进来……

答

我最近在思考奥斯曼历史的时候，就您说的 Locality，本土性，我也有一些想法的。开始是不自觉地，后来是自觉地。就是说，奥斯曼也是一个多元帝国，大半个地中海世界，从北非然后东南欧，巴尔干到 Anatolia，以及阿拉伯世界，那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还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其实秦始皇统一以后没有那么长的朝代，这个算下来，奥斯曼是一个完整的个案。什么叫完整的个案呢？就是他有一个崛起、扩张、极盛、收缩和衰落又彻底崩溃的过程。那么，它这个过程以我们中国人讲大一统这个视角来讨论就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中国人认为是统一好的，不能分裂，那奥斯曼人家也不喜欢分裂呀。那奥斯曼帝国终究是崩解了，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收缩、衰落和崩溃的过程中，维护帝国的人们又是怎么应对的，怎么不得不去接受和解释这个过程，直到今天，各种历史的解释仍然在继续。作为后续，阿拉伯人、巴尔干人的历史观里面，他们怎么看奥斯曼帝国，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是负面的评价，现代土耳其人自己，一开始对奥斯曼帝国也是疏离的、敬而远之的，也算是加负面的评价。而今天，人们又经常听到 New Ottomanism 嘛，现在对帝国的兴趣又复兴了，又对奥斯曼重新肯定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那么，你看当土耳其人出兵叙利亚的时候，人们说土耳其人是在搞新奥斯曼主义，土耳其经济上在巴尔干地区也很有影响，当地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你看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或者历史不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就没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尽管已经在 Westphalia 体系中被穿上了 nation-state 的外衣，但这是面上的。因为历史中国成长和巩固的过程，也是文明扩展与互动的过程。就像前面提到的葛兆光老师的文章给我们提供的启发，结合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讨论，那么，关于中国之属性的理解，就不能是单向度的，也不能只是中国疆域范围内的视野，还需要多元的，包括中国周边的视野，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历史记载和记忆中，在不同地域的活生生的文化中，中国如何被参与、表达和认知，这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参照，也是我尝试理解

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时候，发现的某些相似性，我的这个经验体现在脑子里就是某种比较研究的视角。这也是我计划要做的东西。

**石井** 很好，很有意思。

**管** 日本人已经做了一些明治维新和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新颖的研究。这其实代表了某种日本学者的本地性。但我前面提到的思路，可能是基于中国特有的在地域和文明结构上的历史经验。这可能是您说的学术研究的本地性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

**石井** 接地气。

**管** 对，接地气。具体说，就是一个日本人用日文思考和表达奥斯曼帝国史，你怎么“接地气”的问题，那我一个中国人研究奥斯曼-土耳其，也需要思考我怎么“接地气”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欧洲人/西方人的研究，很长时期以来，他们也有这个“接地气”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奥斯曼历史上就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它的接地气就是从几百年前就接上了，到现在也还是很接地气的。可是我们，尤其是从东亚文明的这个角度看，跟奥斯曼帝国的联系非常地微弱，“接地气”就有些间接性，需要努力寻找我们的角度。对外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地域研究，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需要找出研究者本身所处的那样一个本地性，从而发现你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相似和有联系的地方。

## 学术生涯与偶然性

**石井**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简单，这个不是特别学术，但是我想问的是，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偶然性质的关系。我今天听你讲这么多，你自己走过来的路，好像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好像改变或者是决定你以后的路子，是吧？而且你是比较乐意接受这样的偶然的或者是命运的安排？我是这样感觉。

**管** 可能会跟性格或个性有关系。

**石井** 现在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咱们的对话以后本科1、2年级学生也会看吧。我们东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优秀，但是他们为什么优秀，他们知道效率。

**管**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

**石井** 对吧。要讲究效率的话可能尽量地要排除偶然的因素，但是人生是离不



开偶然性的。

答 您说的非常好的……

石井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这个偶然性的。

答 回顾看，当然是有偶然性的。我想，人还是要磨练自己的 Personality。就我自己来说，一件事情一旦我要去做，我希望尽力去做到最好，至少就自己的条件而言做到最好。这样，你就必须持续地努力。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发现自己能做到，而且也喜欢做下去（或者至少不讨厌吧），那很可能你就会在不断地自我鼓励的过程中把偶然性就变成了某种必然性，也就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坚持下来吧。所以，你比如说做地域研究，肯定不能只是为了发表 paper，然后追赶热点或潮流，不断地转换自己的关注点。这种现象可能并不少，但我内心是抵制这个的，因为，我觉得对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理解，离开持续性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边你最初对它发生兴趣往往是偶然的，但后边围绕着这些兴趣需要的是一步一步的持续的努力，而这个持续的努力是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当然也有外部的约束，无论是对学术研究的质量，或者对一个博士生或学者自身的标准的评判，随着时间和视野的扩大，都在水涨船高，丝毫不可能放松的。对于上进也有能力做好的人来说，就一定会持续努力。如果能够享受这个过程，那么，结果应该不会很差。尤其是这个过程里，巨大的付出，就更加使人不愿意白白努力。总要有个对自己的交代吧。人的青春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决定了要做什么事，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量去把它做好。

中国越来越开放，学术的进步也是日新月异，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出现条件更好也更优秀的人，虽然年龄差距并不大，但不管是时代还是什么其他个人的原因吧，我会发现很多差距，你比如我讲过不断地进修，很大的原因是自己选择的方向，最初生长的条件在我们国内并不理想，跟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相比，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已经有五六代人可以系统地进行本土培养，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条件。这个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说，就是一种先天不足吧。那这个时候你后续就得不断地努力，当然也有人放弃了，放弃不是我的性格，所以就坚持下来。你说了很多偶然，但我觉得还是要追求比较优秀吧，希望至少不要那么快就被淘汰……

石井 可能你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想法。

咎 哎呀，其实不是很乐观。

石井 是吗？

咎 是的，压力非常地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本土博士毕业的搞外国历史或其他学科的人，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大概十年来，也就是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之中很多人面临的是先天不足条件下的国际竞争。而大学评价体制近年来的迅速西方化，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可以说是求学时代，岁月静好，工作之后，物非人非。也不是说要抗拒国际化，毕竟，要想研究现代的学问，没有西学的训练是不行的，无论你做日本、做中国、做土耳其，因为你用的概念、理论、方法、写作的规范基本上都是从西方来的。

石井 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也都受到西方的影响。

咎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还是有某种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忧虑吧。这可能是我们的学问与教育中这一代人中某些人的、也可能是时代性的问题，也是含有某种偶然性的一个问题，也看你的人生态度是啥吧。

石井 对对。好，正好 2 个小时了。非常有意思。今天到这为止吧。非常感谢。

咎 也非常感谢您。



# 后记

咎涛 石井刚

这个对谈于2020年1月22日举行。地点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东亚艺文书院本乡办公室。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得以面对面交流的事实本身多么难得，多么宝贵。对谈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土耳其、美国、土库曼、日本等国家以及英语、日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阿拉伯语等等语言。话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由地穿梭于这些国家和语言，且始终离不开叙述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是的，我们得益于今天技术的发达和人类文明走向和平繁荣的大趋势，有了条件能将跨越国家和语言的广大世界作为自己的生活世界。然而，后来发展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告诉我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总会伴随着风险和危害性，有时候甚至会带来毁灭性危害。人类自古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疫病流行都与人的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科技和医疗保健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仍然重演着反复出现的抗疫斗争。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因此而放弃跨区域、跨语言的人际交流？我们的答案非常清楚：不能！正如我们的对谈充分展示，我们的成长总离不开跨越各种差别的认识际遇或不期而然的邂逅。

日本最近有一种说法普及开来：当今人类社会处于“病毒时代（with-Corona era）”，在没有普遍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的条件下，人类只能学会与病毒共处，尽可能地避免爆发性流行，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做到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是“与病毒共处（co-living with viruses）”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出现的新生活方式，而是人类作为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有机生命始终遵循且只能遵循的生存条件。我们在技术主导的今天是否是忘记了要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我们在疫情之下封闭在自家中是否是忽略了世界上还有多数人没有能够接受线上教育的经济条件？看来，我们还是需要放眼

世界，以期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此，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深化和成长就非常重要。

对谈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还处在寒假的末期，而到写这篇“后记”的时候，一个学期又过去了，这个学期的所有课程都是以线上教育的方式进行的，未免感觉有一些不真实。但时间不曾为任何人停留——暑假在即了。

希望下次面对面的交流不会太遥远。毕竟，我们的交流还刚刚开始。

2020年6月  
咎涛 石井刚





## 对谈人简介

### 管涛 (ZAN Tao)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东亚艺文书院 (EAA) 访问学者 (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主要学术领域为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研究，著作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重新发现土耳其》(与易鹏、李玲飞合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等。

### 石井刚 (ISHII Tsuyoshi)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东亚艺文书院 (EAA) 副院长。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文著作有《敢问“天籁”——中文哲学论集》(UTCP, 2013)、《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等。

\* 本对谈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东亚艺文书院本乡办公室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 进行



## 編集者

具 裕 珍 (EAA 特任助教)  
前野清太郎 (EAA 特任助教)

## 編集協力

胡藤 (EAA RA, 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建部良平 (EAA RA, 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

EAA Booklet 5

EAA Dialogue 4

Zan Tao × Tsuyoshi Ishii

[咎涛 × 石井剛 2020年1月22日]

著 者 咎涛 石井剛

発 行 日 2020年6月30日

発 行 者 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

製作協力 一般財団法人東京大学出版会

デザイン 株式会社 designfolio / 佐々木由美

印刷・製本 株式会社真興社

© 2020 East Asian Academy for New Liberal Art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